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山西古籍出版社

李商隐集卷一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集



博学工作室



I211/30
:1(5)
2006



「唐」李商隐著

张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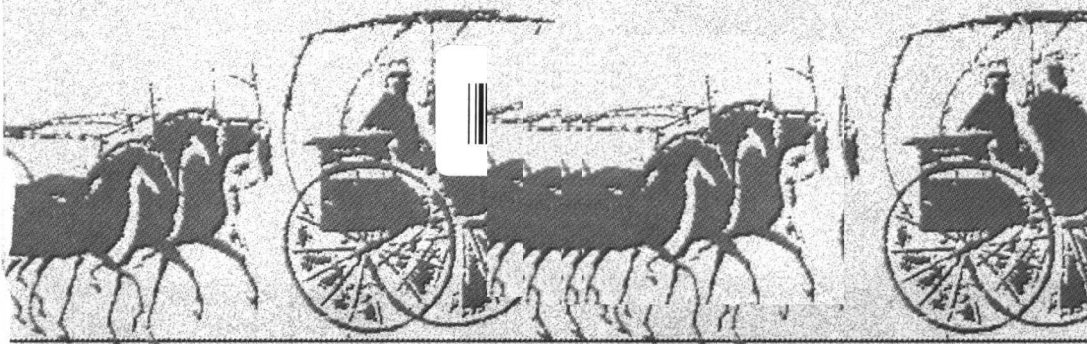
海

解

李商隐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西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集/李强,刘海宁解评.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1(重印)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7-80598-529-8

I. 李... II. ①张...②刘... III. 唐诗-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1361号

李商隐集

著 者:[唐]李商隐	网 址:www.sxskcb.com
解 者:张 强 刘海宁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落馥香	承 印 者: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出 版 者:山西古籍出版社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印 张:9.875
邮 编:030012	字 数:240千字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印 数:1-3000册
0351-4956036(综合办)	版 次:2006年1月第2版
E-mail:Fxx@sxskcb.com(发行中心)	印 次: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Web@sxskcb.com(信息室)	定 价:10.00元
gujshb@sxskcb.com(综合办)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九岁丧父后，奉母归郑州。不久，义山随从叔习古文和书法，希望能振兴家道。十六岁时著《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十七岁时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辟为巡官，从此，开始了断梗飘蓬般的“薄宦”生涯。牛党令狐楚爱其才，教授骈文，并令义山与其子令狐绹等同游。此后八年，除有短暂时间的宦游外，义山一直在令狐楚的幕中。大和九年(835)前后，义山赴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开成二年(837)应举，经令狐绹引荐登进士第。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茂元爱其才，以女相嫁。是时，朝廷牛李党争激烈，王茂元属李党，义山婚娶茂元之女，因之，牛党以“背恩”诟病。

义山素有大志，无意中卷入牛、李两党倾轧的漩涡，为他仕途上的失意埋下了伏笔。后人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珣《哭李商隐》)评价义山，应该说是深中肯綮的。婚娶茂元之女后，义山虽曾有任秘书省正字的经历，但大部分的时间却浪迹于幕府。顿挫中总想奋起，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政治上的落拓与不甘寂寞的情怀拧结在一起，遂使他不得不穿行在入世进取和消极避世的两条道路上。从大的方面讲，义山善于将个人的不幸与时代风云的变幻糅合在一起，善于从个人的际遇入手反映现实，这一表达折射到其诗歌创作方面，不但曲折地反映了唐王朝走向没落时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而且还刻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换言之，徒有壮志、身世零落与关心国事的契合，使义山的诗带有强烈的政治要求；欲罢不能与欲言又止的结合，又使义山的诗生出朦胧的意象。

义山是晚唐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歌约六百首，诗歌题材广



泛，然而，无论是吊古伤今、写景抒情、即事名篇，还是寄寓身世、吟咏爱情，都给人以不尽的遐想和享受。义山诗长于比兴，运典工巧，语言凝炼。无论是读其诗想其为人，还是读其人评品诗格，都给人以不尽的享受。义山善于摄物取象，善于以物象摹写心象。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义山摄物取象总能翻出新意，给人以别样的感受。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与义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和把握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为文之道在于简洁，在表述时应尽量避免语言的歧义。这自然是对的。然而，语言的丰赡性又不是言语的单一表达所能容纳得了的，它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歧义性（模糊性）对语言丰富性的承担。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义山举重若轻，在以物象摹写心象的同时，又以心象反观物象，通过对语言歧义性（模糊性）的发掘来承担难以表述清楚的思想。人们常说，思想大于语言。这是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代替不了思维，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摹的。义山似乎深知其中的奥妙，他善于利用语言的歧义性或模糊性来表述丰富的思想。由此及彼，当语言的歧义性（模糊性）与物象进而是心象混融在一起时，由此来追究义山的艺术世界，产生扑朔迷离而又应接不暇的感觉则是必然的。义山诗深沉蕴藉，其象征性和暗示性与他语言的独特理解息息相关。因暗示而朦胧，因朦胧而象征，因象征而产生多义，因多义而令人捉摸不定，因捉摸不定而耐人咀嚼和寻味，从这一意义上讲，义山诗气韵宏肆、伤感沉郁、绵邈悠长、深婉凄丽、蕴藉含蓄的多样风格，是因义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而形成的。

义山诗在宋代有广泛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对义山诗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继李商隐自编文集后，宋代开整理李商隐诗文集的先河，今天，宋代的版本已无法看到，但还存有清影宋抄本《李商隐诗集三卷》。进入明代，李商隐诗文整理及刊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抄本或刊本有，明悟言堂抄本《李商隐诗集三卷》、明刻本《唐李商隐诗集六卷》、明嘉靖中刊本《唐李义山诗集六卷》（《广十二家唐



诗》，陆汴辑）、明万历金陵书坊王世茂刻本《唐李义山诗集》（《中唐十二家诗》，朱之藩编）、明天启四年（1624）云阳姜氏自刻本《李义山诗集一卷》（《唐中晚名家诗集》，姜道生编）、明崇祯十二年（1693）海虞毛氏汲古阁刊本《李义山集三卷》（《唐人八家诗》，毛晋辑）、明云阳姜道生刊本《李义山诗集七集》（《唐三大家集》，明佚名辑）、明钞本《李商隐诗集七卷》（《唐四十四家诗》）、明末刻本《李义山文抄一卷》（《八代文抄》，李宾辑）等等。清代，在整理李商隐诗文方面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总体成就不如明代。相比较而言，毛氏汲古阁刻《李商隐诗集三卷》无疑是明清刻本中较好的本子，乃至《四部丛刊》据此影印。鉴于此，在撰写《李商隐集》解评的过程中，我们特意选择了毛氏汲古阁刻本作为校勘的底本，同时，考虑到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既总结了前人研究李商隐诗歌的成果，同时又代表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水平，故刘学锴、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也是我们重要的参考对象。总之，《李商隐集》在成书的过程中，吸收了先贤和时贤的大量成果，在此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成果，这本小书不会顺利地完成。

李商隐是唐代重要作家，按理说，解析其诗的时候，应再选一些文章作必要的解析，以便于全面地了解李商隐文学创作的全貌。遗憾的是，限于丛书篇幅上的限制，原先选注的文章部分被迫删除了。看来这一工作只能留到以后再作弥补了。为方便读者使用，书末附“李商隐年谱简编”、“李商隐著作主要版本”、“李商隐研究主要著述”及“《李商隐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我与责任编辑落馥香女士的交往。1994年的夏天，山西古籍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唐宋诗词三十家》丛书，几经周折，落女士把《李贺李商隐韦应物杜牧诗精选》这本书的编撰任务交给了我。打那以后，我们通信，打电话，就一些学术问题或书稿问题进行探讨，很快建立了友谊。我曾表示要到



山西去看一看这位没有谋面的朋友，落女士也十分欢迎。光阴荏苒，我由而立之年步入了不惑之年，又开始向天命之年一步一步地逼近，在这期间，我也从西安到了淮阴。诺言始终没有实现，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位可敬的朋友。岁月流逝，记忆的琥珀已化作一股青烟，人世沧桑，深刻的慢慢抹平。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她说：“我从西安追到淮阴，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找得好苦。”这熟悉的声音是从山西传来的，是落女士。我深受感动。随后，她请我承担山西古籍出版社“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中《李商隐集》一书的解评工作。本来，我无力承担，太忙了，这些年忙得早已失去自我。然而，为了落女士的一片真情，为了报答那横跨十个年头的友谊，我推开手中的事情应允了。我一向平静，喜欢南宋大将宗泽“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的诗句，那是何等的境界！然而，接到落女士的电话后，好几天难以平静，因为它是信任，沉甸甸的信任，是未曾相识而又相知的信任。我必须不辜负这一信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了全书四分之三以上的撰写任务，其余由刘海宁写出初稿，再由我统稿和修改。还要感谢袁茜，她为这本小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承担了校对等事务性的工作。

张 强

2003年9月22日于淮阴



关于李商隐(代序)

陈贻焮

李商隐的遭遇从小就不幸。他父亲李嗣曾经作过获嘉县令。后罢官,为浙江东、西道的观察使所辟,他三岁时就随父赴浙江。十岁丧父,他就开始过孤贫的生活。后来,他曾追述这以后的情况说:“即奉板輿(奉母),以引丹谿。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拊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春。”(《祭裴氏姊文》)可见他回籍以后,家贫势单,无处投靠,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他是长子,于是撑持门户的重责,很早就落到了他的肩上。这就使得他渴望早日成名得官,以“立门构”(同上),光宗耀祖。这时他朝夕萦心的是这样几件事:一,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的灵柩运回原籍,归葬祖坟。他说:“祖曾之前,未一完兆,骨肉之内,犹有旅魂。”(《祭徐氏姊文》)又说:“垂兴欲堕之悲,几有将平之恨。”(《祭裴氏姊文》)所以急欲迁坟改葬,以使“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同上)。二,培养亲属为官作宰,重振家声,光宗耀祖。由于他深深感到除了他一人以外,亲戚之中没有做官的,家族日渐衰落:“宗绪衰微,簪纓殆歇;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将使泽底名家,翻回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因此,不仅自己要努力博取功名,还要教育、扶植兄弟、族人、亲戚成名。他在《祭徐氏姊文》中说:“仲季二人,亦志儒墨。于显扬而虽未,在进修而不隳。……今嵩、奂二子,既为我甥,誓当抚之,以慰幽抱。男劝其学,使得禄仕。”又在《祭处士房叔父文》中说:“瑊等既幽明无累,年志渐成。则当授以诗书,谕其婚宦。”可见他对这方面是十分



关心的。三，为弟妹办理婚嫁大事，生男育女，传宗接代。这就是他在《祭徐氏姊文》中所说的：“伏以奉承大族，载属衰门。三弟未婚，一妹处室。息胤犹阙，家徒索然。将恐烝尝有旷阙之忧，邱陇绝芟除之主。”

后来他作了官，没有几年母亲去世。在居母丧期内，他就趁此机会将宦囊积蓄和“交亲馈遗，朝暮饘粥，收合盈馀，节省费耗”（《祭裴氏姊文》）所得，大办迁葬的事。他这次迁葬的坟墓很多，计为安阳曾祖妣自荥阳返棣怀州合葬、为堂叔李某改葬、为裴氏姊自获嘉返葬荥阳、为徐氏姊改葬、为四岁夭折的侄女（当为义叟女）寄寄自济邑返葬荥阳——上自曾祖母，下至殇婴，旁及堂叔，一共办了五起，可说了却他平生第一桩心愿，而使他感到十分心安，因此他在当时所写的几篇祭文中曾一再欣慰地说道：“今则南望显考，东望严君，伯姊在前，犹女在后，克当寓殒，归养幽都。……小侄寄儿，亦来自济邑，骏魂稚魄，依托尊灵。远想先域之旁，累累相望，重沟叠陌，万古千秋。”（同上）“呜呼！茱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楸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祭小侄女寄寄文》）

大中元年三月，礼部侍郎魏扶知贡举（见《旧唐书·宣宗本纪》），他弟弟义叟擢进士第，他喜出望外，即向魏扶献书上诗（集有《献侍郎钜鹿公启》、《喜舍弟义叟及第上礼部魏公》）。其余诸弟诸甥功名未详。他的《骄儿诗》说：“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阶前逢阿姊，六甲颇输失。”又《上河东公启》说：“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后来他子嗣也有了。而弟婚妹嫁事则未详。可知他的第二、第三个心愿，也大都是了结了的。

他的这三个心愿，都是封建时代所公认的人生大事，本不足为奇。但是，像李商隐那样虔诚地全力以赴，那样带着极其感伤的情调为亡灵的幽冥“生活”着想，则除了受宗法思想和封建感情的支配外，还有其特定生活遭遇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小以来，几伤离丧，人单势孤，家道衰微，饱受“生人穷困”，深感世态炎凉，而更加看重家人骨肉之情，感情更加脆弱所致。



根据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认为:一,李商隐少壮年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尤善为诔奠之辞”),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也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

二

李商隐幼年从浙江奉丧返里,曾随堂叔李某学习,很为他堂叔所赏识。他的《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说:“商隐与仲弟义叟、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教为文章。生徒之中,叨称达者;引进之德,胡宁忘诸?”又《祭处士房叔父文》说:“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诱。”即叙其事。据《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记述,他的这位堂叔是一个讲孝道、轻禄仕、不事权贵、愤世嫉俗、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真处士”,他“通五经,咸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合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李商隐是今体诗文的集大成者,“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旧唐书·文苑传》),但是他早年是“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同上)的。他的《樊南甲集序》说:“樊南生(商隐自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郢相国(令狐楚)、华太守(崔戎)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又说:“仲弟圣仆,特善古文。”他和义叟的古文修养都很深,显然是出于他这位着意复古的叔父的教导和熏陶。虽然如此,他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活泼、敏锐的。他的《上崔华州书》说:“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这倒很像他叔



父的口气)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所论所为,很有离经叛道意味,可见他当时是不甘愿受儒家教条的束缚,而要求有所创新的。他少年时所作的《才论》、《圣论》今不传,不知其中的议论如何。他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说:“次山(元结字)之作,其绵远长大……不得尽其极也。而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他那种要求独辟门径的创新精神于此仍然可见。

李商隐后在令狐楚、崔戎门下,随之习今体章奏。令狐楚原是名幕,据说他“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旧唐书·令狐楚传》)。李商隐的《樊南甲集序》说:“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谓令狐楚。楚于太和九年进封彭阳郡公)章檄,樊南穷冻人(商隐自谓)或知之。’”可见他得令狐楚的教益最多。所以他的《谢书》说:“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之后他“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喉于任(昉)、范(云)、徐(陵)、庾(信)之间”(《樊南甲集序》)。由于对六朝骈俪文、格律诗下过一番工夫,他的四六今体又精进了一大步。于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同上)当时章表书启皆用今体,讲究骈偶用事。因此,凡精于此道的,就很受重视,多为公府交辟。前面已提到令狐楚曾因擅长章奏而名重一时。就是与李商隐关系甚深的另二人——他岳父王茂元和重表叔崔戎,也莫不如此。《旧唐书·崔戎传》说崔戎曾“为藩镇名公交辟”,后其“驳奏为当时所称”。史传虽未载王茂元为书记事,而李商隐的《为濮阳公陈情表》却说他曾如“掌檄陈琳,亦常交辟”。

李商隐可算得是当时记室中的后起之秀。他曾为令狐楚、崔



戎、王茂元、杨嗣复、郑亚、卢宏正、柳仲郢诸藩镇所辟。令狐楚病笃时，曾不远千里将他调去为他“草奏天子，镌辞墓门”（《莫相国令狐公文》）。他的《樊南乙集序》说：“葬牛太尉（僧孺），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今不传），二事为不朽。’”足见他的今体文字为时所重。但由于他不幸陷于牛李党争的纠葛中，“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旧唐书·文苑传》），致令“客途飘瞥，使府沉沦”（冯浩语，见《玉谿生诗详注·年谱》），毕生就不得不依靠笔砚糊口了。他的《上尚书范阳公（卢宏正）启》其一说：“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居，危谋燕巢。”其三说：“绢若干，右特蒙仁恩，赐备行李。……捉襟见肘，免类于前哲；裂裳裹踵，无取于昔人。”又《献河东公（柳仲郢）启》其二说：“伏蒙示及赐钱三十五万，以备行李。谨依荣示领讫。……未草檄以愈风，不执鞭而获富。敢将润屋，且以腾装。戴荷之诚，寄喻无地。”他“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上尚书范阳公启》其一），而仍为生计所迫，重作冯妇，为人作嫁。这真是旧时代才智之士的莫大悲哀。在这些上征辟者的谢帖中，也不无清辞丽句、“好对切事”，但用来诉苦叹贫，感恩戴荷，则更加会使作者感到无限酸辛。李商隐曾经表示说，章表书记之事“非平生所尊尚”（《樊南乙集序》），“未足矜”（《樊南甲集序》），但仍一再为之结集作序，序成之后，还感慨系之地附志道：“（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同上）“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夜，火尽灯暗，前无鬼鸟，一如大中元年十月十二日夜时。书罢永明不成寐。”（《樊南乙集序》）可见他并不以此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将它们看成是他潦倒一生的雪泥鸿爪。

草拟朝贺、谢恩等应景章表尚可，但若想以骈辞俚句，字字有出处而又准确地陈情、述职、议论朝政，那就不像一般舞文弄墨那样轻而易举了。令狐楚临终前求李商隐代草遗表说：“吾气魄已殫，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旧唐书·令狐楚传》）可见这在当时非同等闲。骈偶用事，很难得心应手：不是空泛不切，就是削足适履。莫说垂死的人“恐辞语



乖舛”而不敢“自写闻天”，就是一般记室，想也莫不知难而退。令狐楚将李商隐从远地调去代写遗表，崔戎、王茂元的遗表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张采田说：“案义山历就诸幕，若天平、兖海、桂管、武宁、东川，皆先经府主辟置，始管笺记之任。其未入幕中代作表状诸文，如周墀、高元裕、李回、宏农公、京兆公等，集中多有。”（《玉谿生年谱会笺》太和八年）后类表状，或是为他们的幕友捉刀。综观上述几点，可见善写重要今体章奏的，在幕僚中并不很多。这种章奏既要求华丽典雅，又要求准确，那么首先就得在用事上下苦工夫。

黄鑑《杨文公谈苑》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他这样刻意搜求典故，不能说毫无炫博之意，但也由于职务上的需要，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元好问《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崑好，只恨无人作郑笺。”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的诗，用事多而且冷僻，这和他长期写作四六文，养成了用典的习惯，获得了用典的技巧，是有一定关系的。为了写“好”今体章檄，必须掌握、熟悉大量故实；积久成习，如遇作诗，不觉技痒，自然会比一般人更喜欢也更善于用典。

三

当然，他的诗歌用典多，意思隐晦，主要还是出于处境上的实际需要，受其文艺思想的支配。

李商隐以前，诗赋艰涩难解的作家当首推阮籍和庾信。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其《咏怀诗》）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语）。庾信屈身仕敌，“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北史·庾信传》），但又不敢明言，于是就组织故实，写作了《哀江南赋》、《拟咏怀》等，以隐寓其意。可见都有缘故，并非完全故意为了求深求博。李商隐的诗，好用典而艰涩，也同样有这方面的原因。

唐文宗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使人佯



称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甘露，请帝亲往观看，而密伏甲兵于院内，想借此以引来诸宦者而杀之。宦官仇士良率诸宦先至，窥见甲兵，大惊告变，宣称李训等谋反，急召禁兵至；李训、王涯等皆被杀、夷族，牵连甚广（详旧新《唐书》李训等传）。这是当时的一大事变。李商隐曾因之写作了《有感二首》以致慨。其二后半首说：“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何焯说：“末句不特讥开宴用乐，盖深叹文宗明知其冤，刑赏下移，不能出声也。”（《李义山诗集》沈厚铤辑评本）冯浩说：“谋诛宦官，反被惨祸，诚堪怜愤。然文宗任用非人，亦不能辞其咎。”（《玉谿生诗详注》）可见这诗深含讽意。但由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朱鹤龄注本序）。这诗自注说：“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这注语虽然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以他的才情、学识，作两首排律，当是易事，然而竟隔年而成。可见诗人有感于衷，不吐不快；待为诗宣泄，却以事关朝政，顾虑重重，一时就难于找到既确切而又隐晦的“好对切事”来加以表现了。写作之时，怕意显招累，唯恐不深不隐；既成之后，又怕无人领略，有负苦心，便不觉自赘短语，以尽馀意。诗人写作这类政治诗歌的矛盾心情，于此可见一斑。此外，他的《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一诗，也很有意思。《旧唐书·胡证传》载：“（胡证于宝历）二年检校兵部尚书、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太和二年……十月，卒于岭南……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证素与贾餗善；及李训事败，禁军利其财，称证子澥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军人执澥入左军，仇士良命斩之以徇。”冯浩引此，说“诗为此发”。这诗题中“者”字一作“老”。冯浩说：“谓母之者，制题欲晦之耳，不可改‘老’。”不仅本文，就是题目也很隐晦，真是煞费苦心。处在当时那种窒息的政治环境里，即使不敢明言，还要求有所议论，可见他是关心政治，富于是非之心的。

李商隐爱情诗中所指对象，据诗意可揣知当是贵家姬妾、女



冠、乐妓之类。《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臆断她们在女冠中就是所谓“住在华阳观中”的“宋氏姊妹”，在宫嫔中就是所谓“卢氏姊妹名飞鸾、轻风者”，并从而深文周纳、穿凿附会地杜撰出种种莫须有的事迹，则是十分荒谬的。这些诗，或写相思，或叙幽会，这在当时，无论于人于己，于情于事，都宜深婉。这也是促使他诗歌隐晦的一个原因。他的《无题二首》其二说：“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冯注引赵臣瑗《山满楼唐诗七律笺注》说：“此义山在王茂元家，窃窥其闺人而为之……观次首绝句，固自写供招矣，又何疑焉？”供招“窃窥”犹可，若与姬妾、女冠恋爱，就不可据事直书，而须隐约其辞了。这类诗歌，不仅诗意迷离恍惚，就是题目也取得很含蓄，如《无题》、《拟意》、《圣女祠》、《碧城》、《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等等，就是出于这种需要。他的《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题中“暗记”二字也深可玩味。可见他即使于乐妓，也有不愿言宣的情意。他的《柳下暗记》：“无奈巴南柳，千条傍吹台。更将黄映白，拟作杏花媒。”据诗意，似亦此类。

固然不能像从前许多注家那样，完全听信他在《梓州罢吟寄同舍》中所说“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认为他所有写相思、爱情的诗，“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这类诗中，有些的确有所寄托，也不像作者所感叹的那样“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反过来认为没有一首不是写男女之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所论甚是。即使所举具体篇目尚可斟酌，“来是”首也不见得一定有寄托，而他的《访人不遇留别馆》“卿卿不惜琐窗春，去作长楸走马身。闲倚绣帘吹柳絮，日高深院断无人”；《留赠畏之三首》其二：“待得郎来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其三：“户外重阴黯不开，含羞迎夜复临台。



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诸作,则明明作闺人口吻,是以艳情寄意的。既有寄托,即使像这几首诗这样浅显,而作者的用意还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再加上冷僻的典故,那就更要隐晦了。中唐以来,诗歌创作中华靡、雕凿之风渐盛。这股不良诗风,对于李商隐诗歌隐僻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有很大影响。这也不能不看到。

他的《漫成五章》其一说:“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可见李商隐也并不喜欢排偶声律。这似乎不是由衷之言,其实倒真是他的看法。案其《献侍郎钜鹿公启》说:“我朝以来,此道(谓诗歌)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即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根据这一段议论,则可进一步了解:他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变律”和“对属能”,而只是认为既不能偏于“枯槁寂寞”,偏于“怨刺”而无文采,也不能偏于“骄奢艳佚”,偏于“绮靡”而无兴寄。如果能像他那样,“楚雨含情皆有托”,以“绮靡”的辞藻来表达“怨刺”,那么,在他看来,想必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还是不“陷于偏巧”的“兼材”,是很可称道的。可惜的是:他诗歌中虽然也确有不少作品含有政治意义较深刻的“怨刺”,但大多仅局限于个人身世的慨叹,而有些文辞仍不免“绮靡为甚”。

四

李商隐沉沦幕府,浪迹江湖,身世确很凄凉。旧新《唐书》作者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先见知于牛党中的令狐楚父子,后来却作了李党中王茂元的女婿,致使“牛(僧孺)、李(宗闵)党人嗤滴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令狐楚子)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新唐书·文艺传》)而不继续提拔他所致。由于这涉及对他人品的评价,所以每为历来论者所聚讼。

朱鹤龄最偏袒李商隐,曾在其注本序中,就史传所论,为他大力辩护,说李党王茂元诸人好,牛党令狐绹之辈不好,不可“附离为



死党”，而“义山之就王（茂元）、郑（亚，李商隐曾为亚所辟），未必非择木之智，涣邱之公”；并进一步阐述其政治讽谕诗的意义，肯定其艳情之作皆有寄托，以论证他“指事怀忠，郁愤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指杜甫）相视而笑。断不得以‘放利偷合’、‘诡薄无行’嗤摘之”。徐逢源虽也同情李商隐，但尽翻朱说，说：“观其《酬令狐郎中》诗云：‘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则心事和盘托出，不过为贫而仕耳，非有心负绹者。传所云‘放利偷合’，则不诬也。”（冯浩注引）冯浩认为朱序过褒，徐说偏执，说：“义山少为令狐楚所赏，此适然之遇，原非为入党局而然。惟是开成时既以绹力得第，而乃心怀躁进，遽托泾原，此旧传所云绹以背恩，恶其无行也。”又说：“统观全集，其无行诚不能解免。当得第而未仕，则遽背恩而赴泾原。茂元卒，又即膺桂管之辟，泰然有‘不憚牵牛妒’之句。桂府遽罢，卫公叠贬，令狐入居禁近，则又哀词祈请，如醉如迷，迨至令狐宿憾终不可释，乃始真绝望，而以《漫成五章》揭生平之大略，窃隐附于卫公，以冀取重于千载后也。一人之笔，矛盾互持，植品论交，两无定守。呜呼！文人铤肝雕肾于毕生，而徒博后世浮华无实之诮者，其皆自诒伊戚也夫？”

这几种看法，虽各有所见，但都不完全正确。“为贫而仕”，倒是事实，所谓“放利偷合”，却非“不过”仅仅因此。将李商隐和杜甫相提并论，是很不恰当的；且其《无题》之类，也并非都有政治寄托。然而他也确如朱鹤龄所说，“观其活狱弘农，则忤廉察。题诗《九日》，则忤政府。于刘蕡之斥，则抱痛巫咸。于乙卯之变，则衔冤晋石。太和东讨，怀积骸成莽之悲，党项兴师，有穷兵祸胎之戒。以至《汉宫》、《瑶池》、《华清》、《马嵬》诸作，无非讽方士为不经，警色荒之覆国”（《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其正直的一面。因此不能穿凿附会，言甚其辞，说他“植品论交，两无定守”，是一个十足的趋炎附势、欺世盗名的小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商隐以婚于王茂元之故，为令狐所挤，沦落终身。特文士轻于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态。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绹父子党牛僧孺，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涣邱之公。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何以从之受学？令狐绹见讎之后，